

The title is written in large, bold, red Chinese characters. The top line reads '昨夜星辰' (Stars of the Last Night) and the bottom line reads '昨夜风' (Wind of the Last Night). The text is set against a background that is split vertically: the left side is a dark reddish-brown color, and the right side is a light blue color. Several decorative elements are scattered around the text: a green and yellow star above the first '夜', a white and red star to the left of the second '夜', a blue and white bird-like figure to the right of the second '夜', a green and yellow star to the left of the first '昨', and a white and red star to the left of the second '昨'.

# 昨夜星辰 昨夜风

谭启浩 陈向兰 著

---

新华出版社

2267  
P12

# 昨夜星辰昨夜风

谭启德 陈向兰 著

校外 陈向兰 赠



A0875935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昨夜星辰昨夜风/谭启浩 陈向兰 编. - 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0. 12

ISBN 7-5011-4966-6

I. 昨… II. 谭 陈… III. 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45495 号

**昨夜星辰昨夜风**

谭启浩 陈向兰 著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宣武门西大街 57 号 邮编:100803)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7 印张 100 千字  
2000 年 12 月第一版 2000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000 册  
ISBN 7-5011-4966-6/1·259 定价:12.00 元

# 第一辑

## 万家忧乐到心头

在十年动乱中，我们党失去了许多优秀儿女。田家英就是其中的一个。田家英从一九四八年起，就担任毛泽东同志的秘书，到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三日含冤逝世。他在毛泽东同志身边工作了十八年，参加了《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及毛泽东的其它许多著作的编辑、注释和出版工作，对宣传和普及毛泽东思想，倾注了大量的心血。这样一位有才能的共产主义战士，为什么林彪、江青必去之而后快呢？就是因为他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贞。我们从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时，田家英在庐山的题联中，可以得到很生动的说明。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正式宣布批判彭德怀同志后，田家英、李锐、吴冷西与陈伯达等四人，沿山漫步，各有心思，田家英心情抑郁来到山半腰的一个石亭上，远望长江天际流，近听山中松涛阵阵。面对此情此景，有人提议在没有楹联的亭柱上题联，田家英写了这样一副对联：“四面江山来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

这副对联是清代人陈大纲在岳阳楼上的题联。陈联说的是古人，是说千古名篇《岳阳楼记》的作者范仲淹的壮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田家英对庐山大风波所形成的不正常的政治气氛，了解最深切，因此借用这副对联来抒发自己的情怀。他

不是口头上说了完事,而是身体力行。一九六五年,田家英参加整理一个谈话记录,他实事求是,反对把《海瑞罢官》一剧说成是为彭德怀翻案的做法。不久,被混入党内的坏蛋和某些卑鄙小人告发,被定下篡改毛泽东思想的大罪,因而招致了“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杀身之祸。

载深圳特区报副刊 1985.4.20

## 绝塞归来吴季子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真正的友谊应该是道义之交。我们颇欣赏田家英和李锐两名共产党员一生的交情，他们那友谊的花瓣，一瓣一瓣地撒落在严峻的人生路上，很使人感动。

田家英是毛泽东同志生前的秘书，从1948年起，在毛泽东同志身边工作了18年。李锐很长时间也在中央机关工作，后来也兼任毛泽东的秘书。他们俩在延安时代开始就成为文字之交。十几年历经风雨，交情不变，思想相通。1959年庐山会议错误地批判彭德怀同志时，李锐受到株连，被划为彭德怀反党集团成员，庐山会议后，李锐处境不妙，将要受到“流放”处理。两人见面交谈时，田家英谈起历史上吴季子与顾贞观“生死之交”的故事来。田家英对李锐说：“你的处境有点象清代的吴季子了。”

吴季子，指吴兆骞，字汉槎，江苏吴江县人。顾贞观，字梁汾，江苏无锡人。两人为“死生师友”。吴兆骞因顺治丁酉年（1657年）科场案谪戍宁古塔。顾贞观时馆于太傅纳兰明珠家里，太傅长子纳兰性德是有名词人，颇为吴求援于性德，未即答允。后来顾贞观作《金缕曲》词二首寄给吴兆骞，悲深慰切，叮咛告诫，字字出于肺腑。性德见词为之泪下，为言于其父明珠，吴兆骞遂得生入玉门关。当时有人作诗吟咏这件事，说：“金兰倘使无良友，关塞终当老健儿。”

还有一事很使人感动：顾贞观素不饮酒，当他求纳兰明珠太傅

援救吴兆骞时，纳兰明珠正在宴客，拿起一大杯酒，对顾说：“若饮满，为救汉槎。”顾贞观一饮而尽。吴兆骞绝塞归来，回京即到纳兰性德家中道谢，见斋壁上大书：“顾梁汾为吴汉槎屈膝处”，不禁大声恸哭。

李锐于1960年受贬到北大荒，在极艰苦的条件下劳动。时正值国家三年困难时期，农民没饭吃，饿死人不少，李锐身体不好，很难支持。后意外地得到照顾，调回农场场部，生活条件稍为好转，身体才没有垮下去。1961年底，李锐又意外地被通知调回北京。当他与田家英见面时，才知道在北大荒得以调回农场场部，后又得以调回北京，均是田家英同志等友人千方百计救援的结果。李锐深受感动。

李锐回京闲居了两年，于1963年底又被下放到大别山一个水电站当文化教员。离京前找田家英话别。这次，田家英又讲起吴季子。

纳兰性德称顾贞观的两首“金缕曲”为“河梁生别之诗，山阳死友之传”。田家英说他和李锐是“道义之交”，“人之相知，贵相知心”，真正的知己，应该如此。很使人痛惜的是，在“文化大革命”狂流袭来不久，田家英因被小人诬陷，而招致杀身之祸了。

在历史上，真正的友谊留下了无数艳红的花束。友谊之花，无论花开花落，都应该是美好的。有感于“道义之交”之可贵，遂成此文。

(载1985《深圳法制报》副刊)

## 升沉不改故人情

冰心在她所写的《记萨镇冰先生》一文中,谈到萨书赠她父亲谢葆璋的对联:“穷达尽为身外事,升沉不改故人情”。是一副意味深长的联语。

萨镇冰,福建人,是我国海军耆宿,清末海军副大臣,民国北洋政府海军总长、福建省长。萨与谢葆璋相熟,是从1900年在“海圻”军舰共事开始,当时萨镇冰是海军副统领兼“海圻”舰管带,谢葆璋是副管带。以后谢葆璋曾任烟台海军学校校长、海军学司长、海军副部长、上海海道测量局局长。

这副对联体现了萨镇冰的风度和风骨,表达了他对谢葆璋的深情厚谊。对己和待人是统一的,一个名利熏心的人,是不可能善待故人的。

不忘故旧,在中国,被视为美德。古诗:“君乘车,我戴笠,他日相逢为君揖;君担簦,我跨马,他日相逢为君下。”是最早反映人们这种愿望的。古往今来,凡是这样做的,都受到人们的传诵。

最著名的是汉光武帝刘秀与他往日的同学严光的故事。刘秀以皇帝之尊,坦然与严光同床共卧,还被严加足腹上。“明主莫将臣子待,故人只作友朋看”。(宋陈政诗)是被作为千古美谈的。

在现代,共和国总理周恩来,1974年接待他五十七年前的同学黄春谷的事情,也是很感人的。黄春谷是美籍华人,在檀香山经营杂货店,他偕夫人来北京旅游,和接待人员说,他和周总理过去



是同学,如果方便,他想见见这位老同学。当时总理年事已高,身体不好,医生让他尽量减少外事活动,但周总理还是见了并宴请了黄春谷夫妇。周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他本来打算不见黄春谷,但看到黄写来的信,称他为“翔宇吾弟”(周恩来在南开中学读书时的名字),不落俗套,很欣赏,所以决定见,如果信里叫总理,说些恭维话,就不见了。

千百年来因受剥削阶级名利观的熏染,居高位而不忘故旧者,毕竟不多。鲁迅先生指斥这种人是“一阔脸就变”。袁世凯对待他的老师张謇就非常明显,他与张謇通信,始则称“夫子”“大人”,继而称“先生”,最后竟称“仁兄”。为此,张謇写信责备袁:“阁下之官阶愈高,则对仆之称呼愈低”。共产党人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按理不应沾染名利污垢,但举世滔滔,能出污泥而不染者有几?袁也烈在南昌起义前当连长,林彪在他手下当排长,袁当营长时,林彪是见习连长,曾经几度是林彪的顶头上司。但全国解放后,袁也烈到北京,林彪却装作不认识。这样的事情在共产党内并不是绝无仅有的。在当今市场经济的大浪潮冲击之中,人们的价值观变化巨大,恐怕更多了。

(载深圳特区报读书版 1996.9.4)

## 人生何处不相逢

在人生舞台上,我们觉得,做人最要紧的是光明正大,不搞阴谋。从历史上看,爱搞阴谋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的,我们从古雷州的历史就悟到这样一条哲理。

雷州位于祖国大陆最南端,古称荒凉之地。自唐宋以后,它为历代封建皇帝放逐罪臣的场所。也许是历史的巧合,也许是历史辩证法真正起作用,在古雷州那片土地上,出现过许多充满戏剧性的人生插曲,很耐人寻味。

宋代宋真宗朝寇准做宰相,寇准与丁谓友善,丁谓得到寇准的推引,升了官并渐居显要。后来寇准发觉丁拂髭拍马,当面批评了他的缺点,丁竟怀恨于心,伺机报复。寇准为人正直,因得罪朝廷而被罢官贬职,真宗命“与小州”,丁谓搞小动作,改为“与远小州”。寇准因而被贬到相州做州官。不久,真宗欲谪寇准江淮间,丁谓竟将寇准弄到湖南道州去。最后丁乘真宗驾崩的机会,又做了手脚,将寇准贬到雷州。丁谓在派中使赉敕书命寇准移谪时,竟“马脖故悬天子剑”,欲置寇准于死地。寇准没有上当才幸免于难。

过了几个月,丁谓也被罢相了。贬为崖州司户参军。当他路经雷州时,寇准不记旧仇,派人等在路上送了一只蒸羊给他。丁谓想见寇准一面,寇谢绝了。后来寇准在流放地病故,丁徙雷州,也在雷州病死。

事隔七十多年后,又有苏辙、章惇贬雷州一事出现,也发人深思。苏辙与章惇,因党争结怨。绍圣元年,章惇得势为相,残酷打

击他所嫉妒的对手。被章打下去的大小官员八百三十人，苏轼、苏辙兄弟受嫉妒和受打击最厉害。绍圣五年，苏辙辗转贬广东雷州，章惇还不放过苏辙，下令被流放的人不准居住官舍。雷州人吴国鉴崇敬苏，在城南建屋款待，章惇又以苏辙“占居民房”的罪名，要州官追究。好在苏辙有正式的屋租契券，章的阴谋才没有得逞。过了三年，徽宗建中靖国元年，章惇也被贬为雷州司户参军。这次章自食其恶果了，他也要向老百姓租房子住，得到的答复是：“前次苏公来，差一点被章丞相破了我的家，我不能再做这种事情了。”搞得章惇非常狼狈。

对于寇准与丁谓在雷州相遇的事情，欧阳修在《归田录》里曾有“若见雷州寇司户，人生何处不相逢”为记。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陈毅同志面对林彪、江青一伙的淫威，就时常说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一切善良正直的人，即使他的道路坎坷，遭遇艰难，一生可能需要经受各种各样的误解，委曲，折磨以至打击陷害，有时不免使人感到是“永远的遗憾”，但历史终将证明，他的精神境界是高尚的，生命是有价值的。而一切搞阴谋的人，尽管他也可能得势于一时，但最终还是逃脱不了历史的惩罚的。过去丁谓、章惇是这样，在社会主义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曾经不可一世的林彪、“四人帮”，也只能如此。饱经历史的风风雨雨，人生的沉浮起落，如今的雷州西湖还保留着纪念寇准的寇祠、莱泉井，纪念苏轼兄弟的苏公亭；古雷城里还有苏辙住过的苏公楼和由此而得名的苏楼巷，可是那一度炙手可热的丁谓、章惇到哪里去了呢？到历史的垃圾堆里去了。这雄辩地说明：历史是公正的，人民是公正的，历史的辩证法是严峻的。清江南人武进士钱方起作《雷阳吊古》里有诗为证：“章惇自昔居难儆，苏氏于今亭尚名，信史千秋谁近是，东流万古孰能平。”

(载深圳法制报副刊 1987.6.5)

## 彭湃与陈炯明

在现代史上广东海丰县出了两个重要人物：彭湃与陈炯明。他们都对中国革命的进程产生过重大的影响。不过各自所起作用完全不同，一个推历史车轮前进，一个则逆历史潮流而动。

彭湃 1896 年出生于一个工商业兼地主的大家庭，少年时便嫉恶如仇。一次，他的祖父与士绅发起送万人伞给贪赃枉法的卸任县长唐汝梅，他曾向祖父劝阻，祖父不听，他便与同学一起到制造万人伞的店铺里偷偷将他祖父和别的熟人的名字剪掉了，使万人伞无法送出。青年时代彭湃便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1919 年在日本留学参加了维护祖国尊严的斗争。不久便开始研究社会主义学说。1921 年留学回国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担任了海丰县劝学所长、教育局长。难得的是彭湃洞悉民间疾苦，深入到农民群众中间。后来成为我国农民运动的先驱。他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创建了海陆丰苏维埃政权，曾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领导地下斗争。1929 年在上海时，牺牲在国民党的屠刀下。

彭湃满门革命，他的结发夫人蔡素屏和后来结婚的妻子许冰都为中国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的儿子彭仕禄抗日战争时参加东江纵队，彭洪解放后任海丰县副县长。老作家聂绀弩于 1964 年赠彭湃母亲周凤的诗说：“风云龙党彭三杰（彭湃排行第三），宇宙光荣母一家”，彭湃和彭母是当之无愧的。

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陈炯明是革命前辈，他参加孙中山领

导的革命活动,加入同盟会,并和其他同盟会员在海丰创办了《陆安自治报》,提倡社会改革,鼓吹反清民族革命,彭湃在海丰中学读书时,是深受过这份报纸的影响的。武昌首义后,陈炯明与海丰的革命党人,在惠州举义响应。广东光复后,陈炯明担任了广东副都督、代都督。1918年奉孙中山之命,率领粤军以护法援闽名义入闽,攻占漳州,使漳州面貌一新,成为国民党的政治和军事中心。1919年秋,列宁曾派代表带亲笔信给陈炯明。陈俨然是当时的革命中坚,以后先后被孙中山任命为粤军总司令兼广东省长,陆军部长兼内政部长,被孙中山倚为左右手。但是陈炯明不忠于革命,他阻挠孙中山出师北伐,甚至于1922年勾结英帝国主义和直系军阀,背叛孙中山,成为盘踞广东东江的地方军阀。1925年,陈炯明所部被广东革命军第二次东征时歼灭。陈炯明流亡香港做寓公。

孙中山逝世后,陈炯明妄图逃脱历史对他的判决,致挽联掩饰自己,说什么“功首罪魁,留得青山青史在”。有人看后作诗云:“饰非空撰挽孙联,此日人心敬逸仙,何待千秋青史论,罪魁功首已昭然。”历史是无情而公正的。今天到海丰的人,都要去瞻仰彭湃故居及记录着彭湃光辉业绩的红宫,也会去看看当年东江地方军阀陈炯明的豪华住宅。面对这两个正面和反面的典型人物,人们从中会得到许多历史的教益。

(载深圳特区报 1988.3.31)

## 受崇拜者与受咒骂者

彭湃与陈炯明，均出生在广东海丰。陈炯明比彭湃年长 21 岁，两人是同乡，听说还有亲戚关系。可是，由于他们选择了不同的生活道路，彭湃坚持革命，代表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陈炯明则背叛革命，背叛孙中山，反对北伐，炮轰总统府，违反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两人的结局迥然有异。

作为一个时期革命的“同路人”、同乡、亲戚，彭湃与陈炯明之间有过许多戏剧性的来往。

1923 年秋天，强台风袭击海丰，农民受灾，减产歉收，彭湃支持农会闹减租。提出“至多按三成交租”，引起地主豪绅和地方政府的极大不满和恐惧。地主豪绅依仗县长王作新的支持，坚持要十足收租，不让减租，农会不答应。七月初五，王作新派出军警 300 人包围了农会，逮捕农会骨干 25 人，并下令通缉彭湃。与此同时，派大批军警下乡武装逼租，发生了震动全省的“七五”农潮。彭湃带两名代表步行 6 天，前往老隆找陈炯明。那天下午，陈炯明正在看电报，忽报彭湃来访。在此之前，已有彭湃的老师林晋亭向他力荐彭湃：“此人多才，能干，是治国平天下的好材料！”

陈炯明来到客厅，同彭湃握手表示欢迎。他见彭湃身穿有补丁的农民衫裤，就立即吩咐秘书，拿几套新衣服出来，请彭湃先洗个澡，休息两天。彭湃严肃地说：“我这次到来，不是来作客，而是以农会代表身份来谈判的。”陈炯明笑笑说：“何言谈判？商量就是

了,最甜是家乡水,最亲是故乡人嘛!有话好说。”彭湃开门见山,要求他立即下令各地政府释放被捕农会骨干,支持农民减租。陈炯明找不到理由反对,只好一口答应下来。

陈炯明多次给彭湃发电报,每封电报都说上几句赞赏彭湃和对农会表示同情支持的话。如“君品行高洁,任事努力,炯所素佩。”彭湃把陈炯明的电报在报纸上公开披露,造成一种假象,使社会上许多上层人士都误认为陈炯明是支持彭湃,支持农会的,而不敢持公开反对农会的态度。这可急坏了海丰县长王作新,他写信质问陈炯明。陈炯明有苦难言,发起火来,他大骂王作新:“你们100个绅士也比不上半个彭湃,你知道么!”

被捕农会骨干终于全部获释,减租斗争取得胜利。

正当大批农友从狱中获释归来,广大农民士气旺盛之时,陈炯明的弟弟陈炯光去世,他要回乡奔丧。彭湃组织了声势浩大的农民队伍排成十几里夹道“欢迎”示威,提出立即恢复农会的要求。并要他公开表态,陈炯明无奈,只好当即表示说:“工人有工会,商人有商会,学生有学生会,农民哪可无会?!”于是,原来受到镇压被勒令解散转入地下的农会迅速重新恢复公开活动,广大群众又集合到农会旗帜下。

当广东革命政府在中国共产党的倡议和支持下决定进行东征,攻打陈炯明时,彭湃勇敢地参加了东征,同陈炯明进行了一场生与死的搏斗。彭湃回到家乡时,六七千农友来看望他。当滇军、桂军杨希闵、刘振寰又发起叛乱,进犯广州,东征军不得不回师广州平叛时,陈炯明卷土重来,豪绅地主反攻倒算,他们放火烧了彭湃的家,捕捉彭湃的亲属,枪杀大批共产党员,于是,国民革命军于1925年10月举行了第二次征讨陈炯明的东征。

(载深圳商报副刊 1991.10.31)

## 从茅盾身后受冷落想到的

中国文艺界近期出一大新闻：某文化公司几位学者策划出《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金庸被列上“文学大师”，排名第四。仅次于鲁迅、沈从文、巴金，在金庸后面才有老舍、郁达夫、王蒙等高手。台湾三毛也排上“文学大师”行列。穆旦则列为“中国当代诗人之首”。而茅盾，还有郭沫若等中国现代杰出的革命文学家、无产阶级英勇的文化战士、小说巨匠、语言大师却被轻轻地“抹”掉了。

编大型“文库”，不提茅盾，这不是太荒唐了么？

茅盾文集有40卷。他的作品，连同他的名字，连同他60多年的革命文学活动，是影响着一整一代以至几代中国青年的。从30年代加入左联开始，他一直与鲁迅并肩战斗！他从1928年先后写下《幻灭》、《动摇》、《追求》，到创作《子夜》、《腐蚀》、《虹》、《林家铺子》等等大量优秀文学作品，在国内外都有深远影响。以鲁迅，郭沫若、茅盾为代表的革命文学、进步文学，一直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这是20世纪的历史事实，不是任何人可以任意抹掉的。新中国诞生后，茅盾被选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文化部长，这也并非偶然产生，而是反映了历史和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文化界、作家群、读者群的意志的，即使他和他的作品也不可避免会有缺点和不足，但毕竟国内外学术界大都肯定他的历史地位。日本的《20世纪文学》，中国作家只提两位，就是鲁迅和茅盾。日本现在还准备



重新翻译茅盾的长篇小说《子夜》。当年茅盾写出长篇小说《子夜》时,那是轰动中国革命文坛的大事。鲁迅先生也为这一重大收获而高兴与自豪!从鲁迅书信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他当时写信给远在国内外的朋友说:“我们有《子夜》!他们写不出。”(我们,是指左联;他们,是指当时国民党的御用文人。)1934年3月,国际革命作家联盟机关刊物《国际文学》为迎接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召开,向各国著名进步作家发函、征求专题意见稿,对中国作家发函的也只有鲁迅和茅盾两人。

据报导,把茅盾“抹”掉的那个大型“文库”总策划认为:“过去对于本世纪中国文学的评价一直受着非文学因素干扰,现在用纯文学标准重新审视文学的时机已经成熟。”他在这里没有说出“非文学因素”到底指什么,但有“纯文学标准”的提法,这是向人们提出了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即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总结出来的文艺批评的标准,到底还应该坚持,还是应该抛弃?社会主义文学的地位,是应该珍惜,还是应该从根本上取消?

人们没有忘记,早在80年代初期,就有人写文章说:抛掉“庸俗的政治决定论”之后,茅盾的《子夜》不过是“一份高级形式的社会文件”。那一阵子,许多进步作家和作品都一一受贬。如杨沫的《青春之歌》就被贬为恰如“林花落了春红、太匆匆”一般的旋生旋灭之作。连鲁迅当时也被加以贬损。一些人极力鼓吹“文学要彻底脱离政治”,“要重写中国文学史”。

从近期抛出的文学大师“排名榜”来看,我们认为:茅盾身后受贬的事,显然不仅仅是对某几个作家、某几项作品的文学评价问题。而是他们真的要为“重写中国文学史”作准备并寻找“突破口”了!

关于金庸、三毛等作家应否列上“文学大师”,我们不想发什么议论。我们只觉得:对任何一位作家及其作品,是可以有各种各样